

蘇曼殊詩文選注



曾德珪 选注 陕西人民出版社

蘇曼殊詩文選注

曾德珪選注

陝西人民出版社

苏曼殊诗文选注

曾德珪 选注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礼泉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 插页2 字数260,000

1986年1月第1版 198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00

统一书号: 10094·474 定价: 2.10元

前 言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建立了共和国，结束了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革命。但是，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就被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支持的、并拥有很大反革命实力的袁世凯所篡夺。在辛亥革命的整个过程中，民族与民族，阶级与阶级，革命与改良，以及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从思想到政治，从局部到全面，一幕一幕地展开，极其尖锐复杂。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辛亥革命中曾经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中许多人，在爱国反帝、兴汉反满、反专制建共和的革命口号下，汇集到中国同盟会领导的革命旗帜下，大声疾呼，英勇奋斗，为推翻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和反对封建势力的复辟，做过杰出的贡献。但是，他们缺乏斗争经验，对中国革命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在革命的关键时刻，或者作过无原则的妥协（如对袁世凯）；在革命遭受失败和挫折时，或者产生过失望和悲观的情绪；这些正是中国民主革命中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软弱和动摇的表现。作为诗人和小说家，苏曼殊正是当时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进步知识分子的代表，他集中了他们的许多优点和缺点，反映了他们共同的革命热情和愿望，也表现了他们普遍有过的失望和忧伤。他的作品可说是辛亥革命这块新生的

土壤上而生长出来的一枝脆弱而妖艳的奇花。所以，很自然地曾经赢得一代青年的热烈爱好和赞扬。

苏曼殊（1884—1918），名戡，字子谷，号玄瑛，广东中山县人。父苏傑生，十九世纪末侨居日本，曾为日本横滨万隆茶行买办。他有一妻三妾，其中一妾为河合仙，日本人，传说她就是曼殊的母亲（一说，其生母为苏家所雇一日本下女，名若子，曼殊生后三月，离去不返，由河合仙抚育成人）。曼殊这样的出身，在宗法观念、种族观念都很严重的中国封建旧家庭中，自会受到歧视和轻蔑。由于他多愁善感，自伤“身世有难言之恫”，早岁曾削发为僧。

正当苏曼殊在广东虎山法云寺（实即暂峰海云寺）专心向佛，“端居静摄”时，庚子事变发生了：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挟清帝出走，举国震惊；随即订立屈辱的“辛丑和约”，赔款九万万两。这一事件，使任何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不能不为之扼腕抚膺！苏曼殊当然也不能无动于衷。同时也“不堪为僧之苦”，于是，便走出佛门，回到了他曾感到厌弃的尘俗中来，从此，一直过着半僧半俗的生活。

庚子事变后的中国，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而人民之生计从此日蹙，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由此萌芽矣。”

（孙中山《革命原起》）当时正值中国大量派遣留学生至日本，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文化，探求富国强兵之计的时候。苏曼殊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趁赴日省母的机会，又重新进了旅日华侨设在横滨的大同学校。1902年，考入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学政治；其年冬，加入留日学生的爱国团体青年会，结识了陈独

秀、秦毓璠等革命志士，从此，卷入了当时正在留日学生中进行的革命运动。1903年，改名苏湜，考入日本成城学校，学陆军，显有为革命慷慨从戎的强烈愿望。这年2月，沙俄拒绝按约撤退驻华侵略军，我国留日学生奋起组织“拒俄义勇队”，苏曼殊为爱国热情所鼓舞，亦慨然加入。不久又参加并入中国同盟会的革命小团体——“军国民教育会”。苏曼殊的这些革命活动受到了资产阶级家庭的强烈反对，并断绝其经济接济，而被迫中止学习，黯然归国。曼殊回国后，先游湖湘，主讲长沙实业学堂。继往苏州，任吴中公学教习。后又任上海《国民日报》翻译。这年十一月，报社因内讧停刊，他便潜往香港，拟以手枪前往刺杀保皇党首领康有为，为陈少白所阻而不果（陆丹林《记曼殊出家及欲枪杀康有为事》）。于是，决心以出家人的身分朝拜佛教圣地。

从1904年至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前的数年内，一方面，苏曼殊作为一个佛教徒，曾漫游过暹罗、锡兰、印度等地。学过梵语，研究过佛学；归国后，编著《梵文典》，并应佛学家杨仁山的邀请，在南京“祇垣精舍”讲授过梵文。另一方面，他又作为一个鼓吹革命的文学作家，一度担任过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编辑，参加过以同盟会员为主体的革命文学团体——早期的“南社”，广泛地结识了当时许多著名的革命活动家和爱国志士；他在各种进步报刊上发表过不少诗文，宣传种族革命，抨击社会，发抒其感时伤世、忧国忧民的热烈情怀；并先后在长沙湖南实验学校、明德学堂、南京陆军小学、芜湖皖江中学和爪哇中华会馆的华侨学校，担任过教员，传授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勉励学生“以澄清天下为己任”。

1911年下半年，苏曼殊在爪哇。武昌起义的成功，使位感

到无限欣喜。但是，当他回到祖国后，革命形势意外地发生了变化：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迁北京，孙中山宣布辞职；刚刚建立的革命政权，不到四个月时间，就被袁世凯所窃取；这就不能不使他感到：“临瞻故国，不胜凄恻！”

从1912年春至1918年5月，曼殊逝世前的数年中，他作为一个革命者，积极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的斗争，并和“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及其他许多革命的中坚分子，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是，这个时期的苏曼殊，主要是作为一个专业的文学家在活动的。他参加过柳亚子等办的《太平洋报》和国民党机关刊物《民国杂志》的编辑工作，先后在上述报刊和《南社丛刊》、《生活日报》、《华侨杂志》、《甲寅杂志》、《新青年》等有影响的期刊上发表过不少诗歌、散文和小说。他的比较有名的杂文《燕子龕随笔》，大部分诗及全部小说都作于这几年内。这是苏曼殊写作最为旺盛的时期，同时也是他精神上最为苦闷的时期。由于革命遭受到严重的挫折和失败，许多的革命者都陷入彷徨和苦闷之中。原来有过消极遁世思想的苏曼殊，这时虽也萌发过“向千山万山之外，听风望月”的念头，却因为“尘根未断”，不忍离开，并总是难以忘怀世事。于是，和“南社”中的一些诗人一样，常出入于歌场酒肆之中，借醇酒美人来排遣自己的郁闷；终因忧伤过度，饮食不节，在贫病交加之中，结束了他短暂的一生；死时，年仅三十五岁。真是：

人间花草太匆匆，春未残时花已空！

苏曼殊曾托迹空门，所以，他有佛家的消极避世和虚无主义思想。这种思想使他在民国初年，党人多已飞黄腾达的情况

下，决不恃功邀禄，涉足仕途；同时，也使他在酒绿灯红之际，能够自行敛抑，收束身心，“不一破其禅定”。他也有严重的消极影响，他和当时的革命运动长期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他的一些作品明显地带着消极颓唐和虚无主义的色彩。不过，我们从苏曼殊一生的行事和他的全部作品来考察，在他的思想中占主导地位，则是他的爱国主义思想。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半个世纪以上的屈辱的历史，使他感到羞愤和不满，从而激发起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尊心。他长期地居留国外，但他丝毫没有忘怀自己苦难的祖国。他的母亲是日本人，他对待母亲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在辛亥革命前后的那些年内，他差不多每年要去日本探望母亲，并在那里居留一段时间。日本，事实上成了他的第二故乡。但即使这样，他的民族观念仍很明确，他时时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他决不能忍受日人那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对华人的侮辱（见“倭儒争虱”一事）。他以为，在日本最使他念念不忘的，是那里的人民。其中有慈爱的母亲，有喜欢中国画的姊姊，有待之殷温的“逆旅主人”，有爱过他并和他一样有过不幸身世的“同乡人”，……他赞美过日本的樱花，描写过日本美丽的山山水水，但是，他说：“河山信美非吾土”，他的心总是忘不了那“枯木寒山满故城”的苦难的祖国。他时有“石龟怀海，我岂忘情”的感叹，甚至产生过“吾是弱国之民，无颜以居，无心以宁”的惶恐不安的思绪。苏曼殊在他的诗文中，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时时眷恋祖国的海外游子的动人形象。

庚子事变后，中国人民日渐认识到，清政府是完全投降了帝国主义的，不管国家民族危机如何严重，它也决不愿作一丝一毫的改革。为了争取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富强，必须首先推

翻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因此，革命者遂以“反清”为号召。

“反清”，本来带有浓厚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但在当时那样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反清就和反对民族压迫、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任务，密切地联系起来，而成为辛亥革命时期爱国主义的新内容了。

苏曼殊的反清爱国思想，几乎贯注在他的全部作品中。1903年，他辑录《岭海幽光录》十六则，连续刊载于《民报》，记叙了明清之际清兵在岭南大规模地屠杀汉人的滔天罪行，歌颂了南明抗清斗争中许多爱国将领和草野细民坚持民族气节的英勇事迹。另外，他在《惨社会》的自创情节中，把那些敲榨勒索、鱼肉乡民的满清官吏诅咒为“满周苛（“满洲狗”的谐音）”，甚至公开指斥清朝最高统治者，既是“抢夺别人国家的独夫民贼”，又是“当洋奴的残种”！从这些地方，就可以看出苏曼殊对清朝统治者的无比憎恨。

在苏曼殊的社会思想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同情劳动人民的思想。他在《海哥美尔氏名画赞》中，特别赞扬了海哥美尔氏所画的“劳动者同盟罢工时，室人憔悴，幼子饥啼之状”的图画，认为它反映了社会生活的真实，“令阅者感愤无已”。在编译之作《惨社会》中，他通过男德的口宣称：“世界上有了为富不仁的财主，才有贫无立锥的穷汉”，并且认为“世界上的人，除了能做工的仗着自己本领生活，其余不能做工，靠着欺诈骗别人手段发财的，那一个不是抢夺他人财产的盗贼呢？”基于对被剥削者的同情，他对当时上海资本主义垄断经济发展后，可能造成零商小贩无以为生的情况，表示深切的隐忧：“盖大商垄断之术工，而细民生计尽矣。”可以看出，这是受了二十世纪初期从日本传入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

自然，苏曼殊当时所接受的，多半还是空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对于十九世纪末叶以来在欧美各国一度颇为盛行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苏曼殊是毫无批判地接受过它的影响的，这不但表现在他和刘师培办的无政府主义《天义报》有过密切的联系；还因为他发表过《女杰郭耳纓》一文，对无政府主义者“常寄同情于不幸之贫民”，藐视一切权威的精神大加赞扬，肯定了无政府主义者在欧美各国暗杀政府首脑的恐怖行动，说它是人民“久苦逆境，深恶资本家之压抑贫民，失望之极，又大受刺激，由万种悲愤中，大发其拯救同胞之志愿”而采取的一种合理的、正义的行动。很显然，苏曼殊和当时一些激进的革命党人一样，是主张用狙击和暗杀的办法来对付清廷封疆大吏的。

从反对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出发，苏曼殊也提出了对于封建主义伦理道德的批判。在《惨社会》中，他提出：“为人在世，总要常时间着良心就是了，不要去理会什么上帝，什么天地，什么神佛，什么礼义，什么道德，什么名誉，什么圣人，什么古训……”因此，他把“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话斥为“狗屁”，他假男德之口公开地宣称：“那支那国孔子的奴隶教训，只有那班支那贱种奉作金科玉律；难道我们法兰西贵重的国民，也要听他那些狗屁吗？”这样的话，在“五四运动”十六年前公开发表出来，确实是令人惊骇的。

苏曼殊对于封建主义的伦理道德采取否定的态度，而对于帝国主义者所宣扬的资产阶级的所谓平等、自由，也表示出怀疑和反感。他站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立场，公开谴责说：“彼方孽类，假卢梭浮说，谓人有天赋特权。平等自由，顾日以掠人财产、土地为事，不慧名之，是为淫妇；平等自由云

乎哉，实淫妇之自然主义耳！”（《婆罗海滨遁迹记》）因此，他的反对封建主义伦理道德，不是以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为出发点，而是以他所接触到的朴素的社会主义思想为理论根据的，例如，他曾说：“凡人做事都要按着天理做去，却不问他是老子不是老子；而且我的身体，虽是父母所育，但是我父母，我祖宗，不仗着世人种种人的维持，那能独自一人活在世上？就是我到世上以后，不仗着世上种种人的养育教训，也那能到今日？难道我只好报父母的恩，就把世上众人的恩丢在一旁，不去报答么？”（《悲惨社会》）这在当时来说，无疑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崭新的、带有社会主义因素的道德观念。

在妇女问题上，苏曼殊也有不少独特的、进步的见解。他主张男女婚姻恋爱自由，对阻碍婚姻自由、毁坏爱情和幸福的各种邪恶势力，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和无情的谴责。他认为男女虽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终生的伴侣，但这种自由，决不是“朝秦暮楚”、“向背易于反掌”的“自由”，他特别强调男女在爱情上应有坚贞不渝的态度：“一丝既定，万死不更”，所以，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对那些虽受种种折磨，而“初心不易”，始终保持坚贞爱情的人，表示热烈的同情和赞扬。苏曼殊极力反对资产阶级腐朽堕落的生活方式，他一面为婚姻恋爱自由而呼吁，一面又说：“方今时迁俗易，长妇姘女，皆竞邪侈，心醉自由之风；其实假自由之名而行越货，亦犹男子假爱国之义而谋利禄；自由之女，爱国之士，曾游女市儇之不若，诚不知彼辈性因果安在也？”（《碎簪记》）他反对女子缠足，可是他也告诫“诸女同胞”，勿著奇装异服，“勿徒效高乳细腰之俗”，“当以‘静女嫁德不嫁容’之语为镜台格言”。他对中国妇女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被父母当作“资

物”，被家庭当作“奴隶”，被男人当作“玩物”的悲惨命运，寄予深切的同情。他认为，生而为女子，在当时那样的社会中就是不幸的了，决不当采取庸俗轻薄的态度来对待她们，所以，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描写女子，不但怀着真诚的同情，而且总是以一种天主教修道女似的纯正圣洁的感情来对待她们的。

以上这些，就是沙门佛徒苏曼殊在文学上能够做出许多贡献的进步的思想基础。

苏曼殊是一个具有多方面才能的天才作家，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于诗歌、散文、小说、绘画、翻译等方面，都有一定的成就。

在苏曼殊的文学作品中，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首先是他那些用文言而写的小说。

苏曼殊的小说创作，现在留传下来的有中篇《断鸿零雁记》、短篇《非梦记》、《焚剑记》、《绛纱记》、《碎簪记》、以及未完之作《天涯红泪记》等数种。《断鸿零雁记》曾被改编为戏剧，又被翻译成英语，流传至国外，从民国初年问世以来直至抗战期间，多次再版，广为流传，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知识青年的喜爱。发表在《新青年》上的《碎簪记》，则是他的短篇小说的代表作，无论在思想上或在艺术上都达到了同时代“言情小说”所能达到的最好水平。

苏曼殊的小说，写的都是青年男女离合悲欢的爱情故事，而且毫无例外地都以悲剧而结局。作者揭露出，造成悲剧的原因，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制度，有封建主义的门第观念，有资本主义社会的互相倾轧、金钱骗局和铜臭观念，

也有政治黑暗、时代战乱而造成的家破人亡，生离死别。这在辛亥革命前后那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的中国社会中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

苏曼殊在他的小说中，为我们塑造了一批具有新思想、新品性的青年妇女形象。其中，有《焚剑记》中敢于批评那班时髦的爱国之士“不过虚谈高论，专在荣利”的阿惠；有《绛纱记》中违抗翁命、背弃资产阶级家庭，随县郎私奔归国的五姑；当然最有代表性的，还是《碎簪记》中的莲佩与灵芳。燕莲佩曾留学英国，精通英法文学，她落落大方，才华出众，甚得庄湜“阿姊”的欢心。尽管她对美国资产阶级的金钱至上主义有不满，特别憎恨美国资产阶级“视吾国人直如狗耳”，但是，她却崇拜西方文明，平日穿的是西服，用的是西物，说话中有时还夹杂几句西语，显得颇有几分“洋”气。杜灵芳则不然，她是另外一种类型的新女性。她幼随乃兄“游学罗马四年”，学成归国，“兄妹俱有令名”，却无半点娇矜之色。在她身上，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很深，新时代的革命思想的影响也很强烈，但这两方面却又能和谐地统一起来。她幽娴贞静，决不象莲佩那样才华毕露；她肝胆照人，性格中有几分侠气；她深明大义，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正因为志同道合，所以她才与庄湜结为知己。她不爱奇装异服，却勇敢地追求爱情，直率豪爽。医院探视庄湜，即使有第三者在场，她毫无顾忌地拔簪相赠，并公开说：“君知妾，妾亦知君”，“天不从人愿者，碎之可尔！”这是对封建礼法的公开蔑视和挑战！可以看出，这才是作者理想中的新女性。然而，由于封建势力的压抑和其他各种邪恶势力的阻挠，她们追求幸福爱情的希望全部落空。于是，有的抑郁而亡，有的托迹空门，有的嫁一“木

主”，有的愤而自杀；杜灵芳也不例外。通过这些青年女子不幸命运的描写，作者对当时那个行将彻底崩溃的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作了深刻的暴露。

苏曼殊的小说，不只是从争取婚姻恋爱自由的角度，接触到了反封建的主题，而且，还以爱情为线索，展开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图景的描绘，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的许多方面，决不仅仅停留在爱情本身的悲欢离合的故事上面，这就大大加强了他的作品现实意义。例如，在《绛纱记》中，作者为故事的背景描绘了一幅：“维时四海鼎沸，有维新党，东学党，保皇党，短发党，名目新奇且多，大江南北，鸡犬不宁”的景象，并藉秋云自述身世的机会，揭露说：

“巨绅子……强欲得余，使诬先君与邝常肃（康长素的谐音——笔者注）通，巡警至吾家，拔刀指几上《新学伪经考》

（康有为撰——笔者注）为铁证。以先君之名，登在逆籍；先君无以自明，吞金自尽。”这就反映出清末统治阶级大兴文字狱、镇压维新党，镇压革命人民的罪行。《焚剑记》反映了城市贫民和妓女的痛苦生活，暴露了庚子事变中清廷利用名妓的色相去承办外交的卑劣行为，特别对于清兵大规模地屠杀人民，造成“村间烟火已绝，路无行人，但有死尸而已”的惨象，作了大量的直接描绘。作者借一个被榜为“鬼村”的唯一幸存者的口，诉说了“暴兵以半日杀尽此村人口”惨痛经过，又通过文中女主人公的亲身经历描述了清兵大规模地烧杀劫掠之余，广大农村出现的“以人为食”的骇人景象：

旬日，至东馆（东莞的谐音——笔者）西约十里，日将西坠，有军将似留学生（暗指清政府训练的新军——笔者），

策马而至，见二女临马欲回。二人拜跪马前求食，军将笑，以手探鞍举一火腿示二女曰：“吾侪以此度日，今仅余一腿，尔曹犹欲问鼎耶？”言已，纵辔而去。二女惊悚欲绝，相扶徐行，至一山村，有老者荷薪而归。二女问：“是间有乱否？何以军中以人肉为粮也？”老者不答。女凡三四问，老者厉声曰：“一何少见！吾袋中有五香人心，吾妻所制，凡忘之。”

这是对清政府自1900年以来，多次用兵广东，镇压革命党起义，趁机屠杀人民的滔天罪行的揭露和鞭笞。此外，《非梦记》反映清政府与地主豪绅势力勾结，草菅人命，诬陷忠良的罪恶；《断鸿零雁记》则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通过《捐官竹枝词》的介绍，揭穿了清末整个封建官场贪赃枉法、卖官鬻爵的黑暗内幕。所有以上这些描写，都大大地加强和加深了曼殊小说反封建的主题意义。这样的内容，决不是当时一般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所能有，同时也就证明：苏曼殊的小说决非如某些人所说的：“社会意义不大，只是反映了自己个人的遭遇。”（北大中文系55级编著《中国小说史稿》第七编第十七章第四节）

不可否认，苏曼殊的小说中的确有一种比较浓厚的感伤情绪，他时有幽恨绵绵的哀吟，或万绪悲凉的感叹；他的作品中的主人公的性格，大都表现得十分怯懦，多愁善感，逆来顺受，听任邪恶势力的摆布。在无可奈何之际，作者也哀露过他的“悟尽情禅空色相”的佛教观点；有时甚至暗示：只有逃禅入佛，才能解除一切人世的烦恼。这些都是作品的消极因素。然而，对待这些问题，我们却应该有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分

析，既要估计到作家的世界观，即苏曼殊的悲观厌世的佛家思想对他的作品产生的作用，也要估计到时代环境对作家作品造成的巨大影响。苏曼殊的小说，基本上都作于辛亥革命失败、袁世凯复辟称帝的这段时间之内。一方面，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广大的知识青年有所觉悟，他们有了争取自由和幸福的热切愿望；另一方面，由于当时内外反动势力的强大和相互勾结，黑暗统治十分严重，即使在辛亥革命的高潮中，恋爱婚姻自由与旧的封建婚姻制度的矛盾，也从未解决过。尔后，由于辛亥革命的失败，封建复辟势力的抬头，封建反动统治一度变得更加残酷起来。民主和自由遭受着重重压抑和摧残。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由因而遇到更大的阻力。特别是身为“双重奴隶”的妇女，在恋爱婚姻问题上受到的压力更大。几千年封建礼教的禁锢，使她们既缺乏与封建势力进行坚决斗争的信心和力量，又得不到任何社会舆论的支持，可是，她们又不愿放弃自己的理想，向封建势力屈服，于是，她们便都成了悲剧性的人物：不是殉情以死，便是出家为尼，竟没有一人能作第二个秋瑾，敢于公开地和封建家庭决裂，为争取民族的、阶级的和自身的解放，投入轰轰烈烈的社会斗争，即使是曾经受过西方近代文化的洗礼，并具有侠肝义胆的杜灵芳，也难逃封建势力的魔掌，最终也被迫自杀。这种悲剧结局和它表现的浓重的感伤情绪，正是中国封建势力猖狂复辟，资产阶级革命势力怯弱忍让的折射反映。

同时，我们还必须指出，作者在提出如何解决封建势力与婚姻恋爱自由之间的矛盾时，虽然表现了一种消极悲观的态度，认为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矛盾是无法解决的，只有按照佛家空色色空的观念，自求解脱，或者托迹空门，才能摆脱烦恼。

可是，作者却把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由当作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提出来，并以忠实于艺术的态度，对这种矛盾的实质以及矛盾的各个方面作了如实的描写，使他的作品在揭露“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冲突”（恩格斯《论悲剧》）时，客观上产生的艺术效果是充分地揭露了造成这种悲剧结局的社会黑暗势力的罪恶，引起人们对那种邪恶势力的憎恨，寄同情于那些对爱情忠贞不渝的无辜受害者，而不是赞赏作者那种“忏尽情禅空色相”的自我解脱办法，更不是想去做和尚。不但今天如此，六十多年前也是这样。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作品有这样的消极因素，便否定它的社会意义和社会教育作用。

从艺术上看，苏曼殊的小说更有许多独到之处。

首先，作者对人物外貌的描写，完全脱出了旧小说那种从面貌，身材，衣著，举止，一一呆板地记下来的套式。在这方面，作者用的不是工笔，而是写意的手法；作者不重“毕肖”，而重“传神”。如《碎簪记》写杜灵芳第一次到西湖访庄湜：

此日天气阴晦，欲雨不雨，故无游人，仅见二三采菱之舟，出没湖中。余忽见杨柳毵毵之下，碧水红莲之间，有扁舟徐徐而至。更视舟中，乃一淡装女郎；心谓此女游兴不浅，何以独无伴侣？移时，舟停于石步，此女风致，果如仙人也。

这是写杜灵芳第一次上场，作者采取由远而近的写法，从几个方面进行勾勒：一是扁舟一叶，独无伴侣；二是淡淡的装束，并非浓妆艳服；三是风致洒然，“果如仙人”。可是作者却把